

【农村·农民·农业研究】

依情理抗争:农民抗争行为的乡土性

——基于苏北若干村庄农民环境抗争的经验研究

罗亚娟

(河海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基于苏北地区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经验研究发现,苏北农民抗争行为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依法抗争”“以法抗争”框架来解释。苏北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一般性特征为“依情理抗争”,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情理框架内。具体表现为:环境纠纷发生后,依据习惯性的情理采取抗争行为,对相关法律几无了解,并具有寻求调解的偏好。在抗争的初始阶段,目标往往是要求污染企业与村民互不妨害、和睦相处,而不是驱赶污染企业。纠纷激化后,依情理采取破坏工厂、肢体冲突等抗争行为,没有意识规避违法行为。少数村庄的村民采取诉讼方式进行抗争,诉讼的内在依据往往是经验中的情理而不是相关法律规定。村民依情理抗争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源自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行为惯性的影响。

关键词:农民;环境抗争;情理;礼;法律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13)02-0026-08

进入21世纪,中国工业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并随着工业的梯度转移扩散到更多的欠发达地区。在江苏省内,工业发达的苏南地区在土地和环保的双重压力下逐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淘汰了大量占地多、污染大的企业。与此同时,作为江苏省“经济洼地”的苏北地区则为“温饱”舍“环保”,引入大量被苏南等地淘汰的企业。2005年前后,苏北地区进入环境污染和环境抗争的凸显期。2006年,《省政府关于支持南北挂钩共建苏北开发区政策措施的通知》中提出通过苏南“腾笼换鸟”和苏北“筑巢引凤”实现南北双赢。^①这一初衷良好的政策给苏北地区带来发展契机,但在实践过程中因为苏北地区一些地方政府为求快速发展降低环境门槛,衍生出环境污染的隐患^②。河流死亡、农作物异味、“癌症村”、环境抗争等现象成为历史叙事主体,记叙这一时期在苏北发生的环境巨变及其社会

影响。2007年,我们课题组开始了对苏北地区农民环境抗争的田野研究,持续多年追踪关注苏北地区乡村工业污染问题和受害农民的应对行为。

已有学术研究为我们理解包括环境抗争在内的农民抗争积累了很好的理论资源,但与农民抗争的丰富现实相比,仍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已有解释框架并不能帮助我们洞察农民抗争的内在机制,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研究对象的误读。于是,我们尝试不带预设地进入到乡村社会的独特情境和农民的经验世界,用“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1]理解苏北地区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原型。

研究发现,苏北地区的农民环境抗争行为存在一般性模式:依情理抗争。滋贺秀三曾将中国人的“情理”定义为是中国型的“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和“习惯性的价值判断标准”^[2]。在本研究中,

收稿日期:2012-11-1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费项目(2010BI7314);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10B_047R)

作者简介:罗亚娟,女,博士生,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① 江苏省政府官网:http://www.jiangsu.gov.cn/test/200710/t20071015_115397.htm。

② 中国新闻周刊:腾笼换鸟 苏南污染“出走”苏北? <http://www.cctv.com/news/china/20060123/101930.shtml>, <http://news.163.com/06/0123/10/285789IM0001124T.html>。

我们将“情理”扩展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性的、常识性的做人处事规范。人们对情理的遵循往往是无意识的,来自行为惯性。在苏北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农民依情理抗争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规范和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显著的传承关系。基于上述发现,本文以课题组在苏北地区田野调查中获得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审视已有解释范式的解释力和局限性,重构新的解释范式,为理解中国农民抗争提供一个新的范式补充。

一、有“法律”无“情理”： 已有研究的局限

对现代中国农民抗争行为的解释框架主要有两种。一种解释框架源自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提出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关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比如假装顺从、偷懒、装糊涂等。^[3]这种抗争形式的特征是非正式、低姿态和非公开化的,避免了公开集体反抗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民的各类抗争行为日益公开化,这一解释框架的解释力减弱。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另一种以法律使用程度为准绳的解释框架,最为典型的是以欧博文、李连江为代表的“依法抗争”解释范式和以于建嵘为代表的“以法抗争”解释范式。

欧博文和李连江基于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民抗争的观察,于1996年提出了“依法抗争”^[4]的解释性框架。他们认为中国农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民抗争,“依法抗争”或称“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Policy-based Resistance)。具体是指“农民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农村干部的独断专制和腐败行为时,援引有关的政策或法律条文”,通过“集体上访”等方式“经常有组织地向上级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官员遵守有关的中央政策或法律”。这种抗争形式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农民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其二,农民清楚地了解哪些抗争行为是违法的,哪些行动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可以熟练地做到“踩线不越线”。

2004年,于建嵘提出了“以法抗争”^[5]的解释框架。于建嵘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农民维权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停留于间接以法律为抗争依据,而是直接以法律为抗争武器挑战抗争对

象。于建嵘认为中国农民的抗争在不同时间段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1992年前,多数反抗是“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1992年至1998年间,中国农民的反抗可归结为“依法抗争”;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进入到了“以法抗争”阶段,成长为有组织的政治性的抗争。“以法抗争”的重要特点是农民熟悉相关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并且能够熟练运用法律武器进行抗争。

“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提出后对国内有关农民抗争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两种解释框架在中国农民抗争的一些特定领域确实有一定的解释力。比如“依法抗争”解释框架对农民拒缴违反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收费,抵制不符法律规定的村委会选举等抗争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以法抗争”解释框架对近十多年出现的农民诉讼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这是近年来“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农民抗争的原因。

在继承和发展以上两种解释框架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对这两种解释框架作出了批评性的讨论。批评的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以法抗争”解释框架的单线进化倾向和泛政治化倾向。比如,应星认为农民群体利益表达行动的走向比于建嵘的分析要复杂得多,并不是单向且简单地由“依法抗争”发展到了“以法抗争”,而是交错或者同时使用各种表达方式,并通过对四个农民群体利益表达案例分析批判了于建嵘对农民抗争泛政治化的解读。^[6]吴毅在其研究中也批判性地指出于建嵘对中国农民抗争形式发展变化的理解是一种单线进化式的想象,是否与普遍的经验相符合是令人质疑的。^[7]

除了上述局限性,我们认为“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还存在一个共同的根本性的局限,即笼统地将“法”作为分析农民抗争的切入点,过于强调农民抗争行为中对法律的应用。中国农村社会是复杂多元的有机社会,笼统地以“法”为切点来认识农民抗争是机械且生硬的。在中国传统社会,“天理、国法和人情三位一体”^[8]。而中国现行法律体系是通过外力“植入”社会的“舶来品”,与中国社会本土内生的实践规范尚未形成相互融合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农村社会更为突出。虽然中国实施《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知识五年规划》已近30个年头,期间组织各种“送法下乡”^[9]活动,甚至有

司法下乡、炕上开庭的现象,但如今我们仍然会经常发现现行法律对于村民而言只是一个概念的存在,与他们的经验世界相脱离。因此,“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解释框架背后共同暗含的农民“知法”“懂法”且会“用法”的假设是需要质疑的。

在分析农民抗争行为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农民抗争的内生机制与外显特征之间的区别。在一些案例中,抗争行为的内在依据需要研究者谨慎分辨。“依法”和“以法”往往只是外显特征,实际他们并不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抗争行为因不合他们经验中的情理而起。这类因情理而生的农民抗争大量存在。但是因为情理具有一定的隐秘性,不易被研究者察觉。在我们的研究中有这样的案例,农民常常说要“告”污染企业,或者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表面上看,他们知法懂法并会用法,但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相关法律规定。这样的诉讼性质是在情理内核上附以法律外壳。

二、“礼”与“情理”:

传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农民抗争依据的情理是什么?情理对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以及纠纷的解决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要回答这些问题,既需梳理中国传统乡村内生的社会文化机制,也需要进入乡村社会了解农民的经验世界。我们首先梳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机制,探讨礼与情理的关系及其对社会秩序和乡村纠纷的调处作用。

1. “礼”“情理”与社会秩序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中国社会中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儒家意识形态结构互相耦合,形成持续两千余年稳定不变的社会结构系统。这一独特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表现为“宗法一体化”^[10],即国家结构与家族结构同构,儒家国家学说与宗法家族思想同构。国家社会秩序维持和乡村社会关系处理的核心特征共同表现为“伦理本位”^[11],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处理以伦理关系为重,伦理纲常是构造国家政治和组织社会的本质依据。即所谓以孝治天下。

“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形成,本初在于儒家国家学说的核心“礼”取自民间宗法家族的伦理纲常。宗法家族的伦理纲常由此上升为组织社会和维持国家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12]意思是说“礼”是天理、国法和民众日常践行的宗法家族伦理关系准则。天理、国法和人情三者是相通的,统一于儒家国家学说中的“礼”。这里的人情即情理,百姓习惯性和常识性的处世规范。也因此民间有“伤天害理”“无法无天”等俗语,将日常行为中不道德的行为上升为有害天理、无视国法。

因为儒家国家学说与宗法家族思想同构,乡间百姓无需因为儒家学说的意识形态化刻意在乡村社区之外学“礼”,乡村社会本身就是自然的“礼治”^{[13]24-30}社会。人们经验框架中的情理便是合符礼义的。数千年稳定的乡村社会中,“礼”和伦理纲常稳定不变,人们不需要在道德价值领域创新,据经验框架内的情理做人处事的行为习惯由此渐成。

在中国传统社会,国法与百姓生活中的情理相合相通,国法对乡村百姓而言不是遥远而难以领会的。国法的形成是“以礼的原则和精神,附以法律的制裁,编入法典”,即所谓“以礼入法”^[14]。乡村百姓不需要刻意花费大量精力学习国法,依据生活情理便能推及法理。日常生活中只需要按照基于家族伦理的情理行事就不会触犯国法。民间俗语“法不外乎人情”所表达的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国法与情理相通的现象。

2. “礼”“情理”与纠纷解决机制

传统社会重视社会关系和谐,但民间纠纷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乡村社会纠纷的解决一般有两个途径:其一,乡村社区内依礼调解;其二,通过诉讼由官府调解或依法听断。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村落为自治社区,调解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乡村社会中如果有人做事不合情理,与他人发生纠纷,往往由年老有德的长者或乡绅依“礼”教化调解。教化性调解与诉讼不同,其目的是通过教化纠正不合礼数的行为,使双方回归和睦,使乡村社区回归和谐。与诉讼相比,教化性调解在乡村社区内部进行,程序简单、不伤财且不伤和气。事实上,绝大部分的纠纷都会由调解得到解决。因此,传统乡村社会是“无讼”^{[13]48-58}的,“讼师”和“讼棍”都没有好名声。

当纠纷调解不成而上升为诉讼时,往往会因为乡间加倍的调解而解决。黄宗智对清代社会的研究为此提供了实据。在清代社会的历史资料中,纠纷解决的第一步是亲邻调解,调解不成才会有打官司。但是进入官府并不意味着亲邻调解就此停止,相反亲邻会因此更积极地调解。诉讼当事人也会因

为自己闹得严重了,影响了村社和睦,撤回诉讼。因此纠纷往往在正式堂审之前就解决了。^[15]

地方官吏也常常倾向于通过乡间或官府调解以息讼,不伤乡间和气。清乾嘉时期的官吏汪辉祖在其吏治笔记中便有此类记录,“可息,便息宁人之道。断不可执持成见,必使终讼,伤闾党之和,以饱差房之欲”^[16],“勤于听讼,善已。然有不必过分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借”^[17]。

调解未能解决的少数纠纷由州县衙门依法听

断。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国法是“以礼入法”而成,断讼表面上依法听断,实则与乡间百姓生活中的情理相通。但需要注意的是,与教化性调解相比,断讼必然要分出“泾渭”“皂白”,更为生硬、不留颜面。纠纷因衙门审判暂时解决,但是纠纷双方的矛盾常常因此僵化、激化,有伤和气。

最后,极少数的纠纷通过调解和地方司法不能解决,上诉人可能选择历尽千辛进京告御状,引起皇帝的注意来申雪冤抑,^[18]即所谓京控。京控的解决与地方司法相同都是依据国法,但是会进行更为严密的调查。最终平反冤屈,解决纠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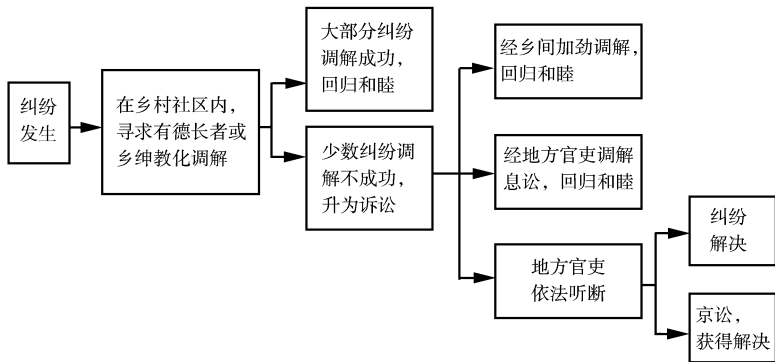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

概言之,中国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之后的两千余年中,虽每隔三百年左右出现朝代更替,但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始终保持不变。儒家学说取自民间宗法家族思想,天理、国法与民间情理相通,在不同层面维持社会秩序。乡村自治社会中,宗法家族规范内化为常识性的行为规范,百姓具有依据情理做人处事的行为习惯。社会关系的安排重视和谐。在社会纠纷的解决上偏好于社区内的长者或乡绅教化调解,规避诉讼。教化性调解旨在以情理化解矛盾,使矛盾解决得合情合理、不伤双方和气。地方官吏也往往倾向于通过乡间、官府调解息讼。听讼、断讼依据国法,但因“以礼入法”,国法与百姓生活中的情理相近。总之,社会行为、关系处理以及纠纷在各个层面的解决尽在人们的情理之中,人们具有依情理行事的行为习惯。

三、“情理”与苏北农民环境抗争的实践逻辑

在苏北农民环境抗争的田野研究中,我们接触

到多个遭遇工业污染的村庄。通过对这些村庄里农民环境抗争的观察,我们发现他们的行为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农民的行为习惯,他们期许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具体而言,表现为以下4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农民采取抗争行为的理据来自习惯性和常识性的情理上的判断,对有关环境侵权的法律规定几无了解;其二,农民抗争行为具有寻求调解的偏好,包括在乡村社区内寻求调解和通过信访^①各级政府寻求调解两种情形,鲜有诉讼发生;其三,在抗争的初始阶段,抗争行为指向的调解目标不是驱赶污染企业,而是要求污染企业与他们互不妨害、和睦相处,在经历企业不守信义持续排污后才将目标指向赶走污染企业;其四,少数村庄

① 信访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经验中总结出的走群众路线的产物,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有传承关系。中国民众在意愿表达和纠纷解决上具有较强的信访偏好,不仅与信访曾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拨乱反正中起到过重要作用有关,还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其一,信访制度源于本土社会文化,更为贴近民众的表达习惯。其二,信访制度对纠纷的化解方式与传统社会中的教化性调解相似。因此,农民抗争行为中的信访偏好特征是一种文化惯性,是对传统社会文化的传承。

的村民采取诉讼方式进行抗争,诉讼的内在依据往往是情理而不是相关法律规定。我们将具有以上特征的抗争行为称为依情理抗争。我们选取两个案例村庄作具体的分析。其中沙岗村^①没有诉讼发生,东井村有诉讼发生。

1. 沙岗村案例

沙岗村隶属于苏北 Y 市大台镇。大台镇是 Y 市的工业强镇,先后被评为“中国乡镇综合实力 500 强”“江苏省文明镇”“苏北五十优乡镇”。2009 年之前,大台镇化工产业的年税收为 3000 万~5000 万元^②,占全镇整个工业年税收的 1/3。立义化工厂是一家小型化工企业,于 2001 年进入沙岗村,年税收 200 万左右,生产氯代醚酮等工业原料,曾被评为“Y 市十大标兵企业”。

2002 年开春,立义化工厂发生化学气体泄漏,将工厂周边农田中的麦苗烧黄。村民们经过商量,到村部要求村委会主任处理此次污染事件。村主任召集几名村民代表和化工厂负责人调解此事,最后达成协议:化工厂可继续生产,但不可再排污;如再有污染情况发生,必须停产。我们可以看到,污染事故发生后,村民们依据日常生活中的情理解决纠纷,而不是诉诸国家法律。寻求在乡村社区内调解纠纷,指向的目标是互不妨害、和睦共处。

2002 年立夏后,村民们发现秧苗生长迟缓,追肥和施药防病都无济于事。他们买来 pH 试纸测试河水结果呈酸性,并发现立义化工厂仍在悄悄排污。他们对化工厂不守承诺感到气愤,填平了化工厂的

排水沟,并要求村干部找来地方环保、植保部门责令化工厂停产。8 月初,村干部要求村民签字同意化工厂恢复生产,村民们一致拒绝,并将通往立义化工厂的道路挖出一条大缺口阻止化工厂的车辆出入,还砸坏了化工厂的门窗,阻止化工厂恢复生产。8 月 27 日,化工厂恢复生产当晚,村民与厂方及派出所人员发生严重的肢体冲突,十多名村民因此被拘留。这是村民的第二次集体抗争,因为立义化工厂不守信义而起,当地村民依然据习惯性的情理行事,没有规避挖道路、砸门窗、肢体冲突等违法行为的意识。

8 月 28 日,村民们来到市政府上访,结果被镇干部和村干部带回镇派出所接受思想教育。回村后,村民们先后组织两批村民到省信访局上访 2 次。随后几年间,面对立义化工厂的持续污染,村民们到市信访局上访 2 次,到省信访局上访 1 次。通过上访政府部门寻求纠纷的解决,而不是通过司法诉讼方式维护环境权益,同样是中国农民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依据经验中的情理而不是法律处事。

几年上访无果,无奈之下,村民们筑土坝拦水截污,将化工厂后方的小河与村内其它河流隔开。厂方则通过地方水利部门将土坝挖开。村民前后 4 次筑坝,水利部门则 4 次强行开坝。2009 年 2 月中旬,立义化工厂排污导致十公里外的 Y 市区停水长达 66 小时,造成特大水污染事件。由此,立义化工厂被责令关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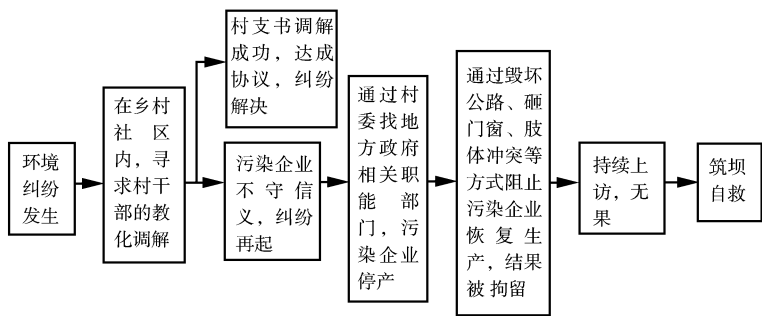


图 2 沙岗村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机制及纠纷解决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沙岗村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的理据来自他们经验中的情理而不是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对照图 1 和图 2 我们可以发现,村民在依情理解事和寻求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两方面是相近的。不同的是,在传统社会里当少数一些纠纷通过调解难以解决时,村民会采用诉讼方

式寻求解决,而在沙岗村村民持续 7 年的环境抗争中一直规避法律诉讼途径。究其主要缘由,有两个方面:其一,村民的习惯性认识中,调解优于诉讼;其二,与传统社会“以礼入法”的国法性质不同,当

① 依学术规范,本文中涉及到的地名和人名均经过技术处理。
② 数据资料由大台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提供。

前中国法律在一般村民的经验框架之外。村民依然习惯于在其经验框架内依情理行事。

2. 东井村案例

东井村^①隶属于苏北 Y 市柳集镇。2000 年 3 月,聚龙化工厂由镇政府招商引资到东井村,生产对氯苯酚等产品,年税收 300 万左右。空气刺鼻、鱼虾死亡和农作物异味等现象引起了村民的担忧。2001 年春夏之交,村民们聚集到聚龙化工厂要求停产。因为化工厂负责人不承认污染问题,一些村民气愤之下采取破坏工厂的行为:拆烟筒、砸门窗、堵水道,结果地方政府以破坏社会治安罪拘留 11 名村民。

2002—2004 年间,面对日益严重的污染,当地村民组织起来多次联名信访市环保局、省环保厅、省农林厅等多个政府部门,均无果。2005 年 3 月中旬,化工厂排污导致村民的鱼塘遭受污染。当地村民抓住机会向地方媒体借力营造社会舆论压力,

但因地方政府对地方媒体的阻拦未能成功。同年 11 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经过调查后报道东井村污染和受害情况^②。县政府将此报道定性为“失实”报道,污染纠纷进一步激化。

数年上访无果,媒体报道没有想象中奏效,于是村民开始打官司。2006 年 3 月,四位村民向县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诉讼状,状告县环保局不作为。但最终因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而县环保局提供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村民们败诉。2006 年 5 月,县政府作出了整体搬迁化工厂的决定。当地村民在得到消息后觉得就此搬迁化工厂对他们不公平。2006 年 9 月,当地 369 名村民组织起来打赔偿官司,但市中院一审和省高院二审均认定村民未能完成初步的举证义务,未能举证证明污染损害事实的存在,判决村民们败诉。2009 年,污染企业整体搬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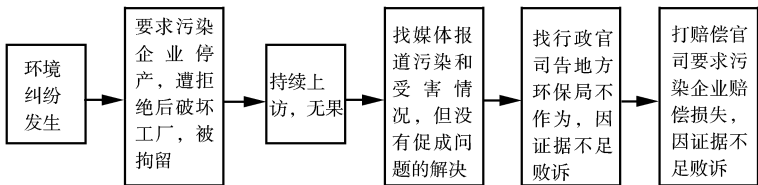


图3 东井村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机制及纠纷解决机制

东井村村民的环境抗争行为经历了破坏工厂、上访、找媒体以及打官司四个阶段。对照图 2 和图 3 可以看到,与沙岗村相同的是,村民在抗争初期都没有规避破坏工厂等违法行为,并在纠纷发生后持续上访多年。与沙岗村农民环境抗争不同的是,东井村村民在上访无果后作出了找媒体和打官司两种抗争行为。找媒体在本质上是制造社会舆论压力,这在中国传统社会是常见的。村民们在媒体上表达依然是情理性的,指责污染企业排污施害的不道德行为导致他们的农副业生产、日常生活和健康受影响。

打官司这一环境抗争行为在苏北乡村中是极其少见的。表面上看,农民是“依法抗争”或“以法抗争”。但深究村民们为自己辩护的依据,我们发现他们对现行法律所要求和认可的证据尚不清楚,他们内在真实的判断依据仍然是情理性的。另一方面,现行法律对环境侵权案件中原告的举证要求远远超过了普通村民的能力范围。实际上,在行为

是否“依法”、“以法”的问题上,不仅村民的行为受到社会文化惯性的影响,法官也因为人情、关系、权力等非法律因素的影响,不能做到完全依法或以法判案。^[19]东井村的案件审理中存在这样的情况。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尝试从乡村社会内部的眼界观察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原型。在对苏北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源自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行为惯性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民的行为选择。

① 有关东井村村民环境抗争的详细过程,笔者曾在发表于《学海》2010 年第 2 期的论文《乡村工业污染中的环境抗争》中详细阐释。因为本文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本文简要叙述村民抗争过程,着重分析村民依情理抗争的实践逻辑。

② 《中国经济时报》上的原话是“2005 年 10 月 23 日,一封几经周折的联名信转到了中国经济时报社”,具体的“周折”过程,记者没有给予说明。在《中国经济时报》网页上已经搜索不到这篇文章,当时较多网站对这篇文章进行了转载,能够说明这篇文章的来源是《中国经济时报》。转载网址比如: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51102/001720.htm>。

“依情理抗争”是苏北农民环境抗争行为的一般性特征。在苏北乡村社会,当环境纠纷发生,村民们没有像西方民众或者中国一些城市居民一样直接找律师打官司,而是依据经验中情理处事,在乡村社区内寻求通过教化性的调解解决纠纷。其目标往往是污染企业与村民互不妨害、和睦共处。当污染企业不守信义坚持排污时,村民们并没有意识规避违法行为,情理性地破坏工厂设施、阻止工厂生产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以上方式不能阻止企业排污的情况下,村民们往往持续多年到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上访而不是寻求司法解决。少数村庄中村民尝试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环境纠纷,但是他们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常常依据习惯性的情理判断正义,不理解现行法律规定。所请的辩护人也往往是只有农民出身的初高中文化水平的法律爱好者,缺乏法律知识和辩护经验,并同样具有依情理处事的特点。可见,村民的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情理框架内。

当然,对苏北农民依情理抗争的研究发现并不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中农民的抗争行为都是情理性的,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中,亦有“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的案例存在。因此,我们在关于农民抗争行为的研究中,需要注意农民观念和行为的的地方性差异。比如,在相对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法律信息通过媒体广泛传播,法律援助中心和环保NGO对民间百姓的法律援助,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些因素都促成一些农民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法律解决纠纷。在当前苏北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社会生活相对简单,日常生活中需要超出情理框架使用现代法律规范解决的纠纷相对较少。随着经济社会活动的复杂化,未来苏北农民的规范价值体系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但是这一变化是单线进化式地从依情理规范发展到依法律规范办事,还是“因事制宜”地在情理和法律规范间做出选择,需要我们在研究中谨慎地探究和考量。

对苏北农民抗争行为的观察和分析涉及到如何在转型社会中观察社会行为特征的方法论问题。在社会转型期,研究者们往往会更为关注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变化,忽视没有发生变化的基底部分。尤其是在当前中国把现代法律定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研究者常常带着法律现代化的目标去衡量村民的行为。事实上,正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基底决定了人们行为是否发生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和什么程度的变化。如果仅关注变化而不关注不

变的基底部分,会有因先入之见曲解研究对象的危险。各种社会形态中都有与其独特的社会行为和社会互动的一般形式,不会在短时段内因为外力的强制、理性的安排设计发生彻底变化。因此,在方法论上研究者需要以研究对象内部的眼界去理解其社会行为的真实意义。

致谢:笔者导师陈阿江教授及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吴金芳、耿言虎等同学为本研究提出了宝贵意见,李彩红、周艳等同学参加了田野调查和讨论,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 [1]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M].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73.
- [2] 滋贺秀三. 中国法文化的考察——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M]//滋贺秀三, 等.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13-14.
- [3] 詹姆斯·C. 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M]. 郑广怀,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 38-44.
- [4] 李连江, 欧博文.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M]//吴毅. 乡村中国评论.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8: 1-18.
- [5] 于建嵘.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 社会学研究, 2004(2): 49-55.
- [6] 应星.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7(2): 1-24.
- [7] 吴毅. “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 2007(5): 21-45.
- [8] 范忠信, 郑定, 詹学农. 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9-25.
- [9] 苏力.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21-39.
- [10] 金观涛, 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2: 9-48.
- [11]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70.
- [12] 冀昀. 左传[M]. 北京: 线装书局, 2007: 599.
- [1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14]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329-352.
- [15] 黄宗智.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5-9.
- [16] [清]汪辉祖. 佐治药言[M]//赵子光. 一个师爷的官场经. 北京: 九州图书出版社, 1998: 12.
- [17] [清]汪辉祖. 学治臆说[M]//赵子光. 一个师爷的官

场经. 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111.

[18] 欧中坦. 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M]//高道蕴, 等. 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566-606.

[19] 罗亚娟. 乡村工业污染中的环境抗争[J]. 学海,2010 (2):91-97.

(责任编辑:李良木)

**Resistance Based on Common Sense Rationality :
Rural Characteristic of Farmers’ Resistance Behavior :
An Empirical Study on Farmers’ Resistance in Villages
of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LUO Yaju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farmers’ resistance behavior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we found that the existing explanation frames of “Law-based Resistance” and “Resist by Law” are unable to explai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farmers’ resistance behavior in northern Jiangsu.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farmers’ resistance behavior in northern Jiangsu is “Resistance Based on Common Sense Rationality”. The justifications, strategies and objectives of their behaviors are all under the frame of their common sense rationality.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the following. Firstly,when the environmental dispute occurs,farmers manifest resistance behaviors according to their habitual common sense rationality with almost no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law. Secondly,they have a preference to seek mediation. Thirdly,at the initial stage,the mediation goal of farmers is to seek harmonious existence of the polluting factory in question and farmers without prejudice to each other’s interests,instead of driving away the factory. Fourthly,when the environmental dispute is intensified,they display such resistant behaviors as destroying the factory and having physical conflicts with the factory’s manager,without any awareness of avoiding illegal act. Finally,in very few villages the farmers try resolving environmental disputes through litigation,which is internally based on the rationality in their experience,but not on relevant laws. In a word,farmer’s resistance based on rationality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behavioral inertia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rural society.

Key words:Farmer;Environmental Resistance;Common Sense Rationality;Li;Law